

论发展经济学中的几个问题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中有几个问题尚有争论：是否存在“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中占什么地位？如何理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发展经济学是否已陷于贫困、停滞甚至走上衰亡？

我将在本文中对这几个问题逐一阐述我的看法。

一、是否存在“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发展中国家的逐个出现，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兴起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号称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并不诞生于1945年之后，而是与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力低下而又提高缓慢，社会经济是僵硬而凝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可能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社会财富如何增进、国民经济如何改善等等问题——也就是生产逐步社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逐渐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或者积极地论证国民经济如何增长和发展，或者消极地解释国民经济何以停滞和不发展，如果自早期重商主义算起，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之前，经济增长和经济思想早在十五世纪就初现端倪，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就陆续地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观察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这些思想汇总起来，是否意味着发展经济学早已形成？或者是否如有人所说，存在着“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Before 1945)①？我的答案是否定式的，理由如下：

第一，1945年前一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的视野是狭窄的、观察是肤浅的，重商主义者非常关心国民财富的增长，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照重商主义者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②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增长即经济的增长，体现为金银即货币的增长，也就是说，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他们由此出发，进而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唯一泉源，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才能有更多的金银流入国内，才能不断地增加国民财富而实现经济增长。重农学派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比重商主义者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还是把国民财富的形态划在较小的范围，而限定只有农产品才是国民财富，只有农业部门才能真正增加国民财富。这些看法虽然符合所在历史环境的需要，但都失之浅薄，并各有谬误，多年来已受到批评。李嘉图从经济增长的过程观察了分配的变化，并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勾画出一幅悲观的图象。马尔萨斯侧重分析经济停滞，把人口膨胀视为经济增长的重大约束条件，他们两者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含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又存在着共同的缺点：没有考虑技术的进步或可

变要素替代固定要素的可能性。马歇尔在他的以微观分析为主的巨著中，提出了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看法：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过程，经济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地普及人群。这种发展观在理论上有其内在缺陷，在实践上得不到有力的证明。

第二，1945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缺少实证分析。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创造人的威廉·配第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进步，从事农业的人数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要相对地减少，从事工业的人数比起从事服务的人数又要相对地减少。这一论点却长期没有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后来人的重视，更没有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作出实证的分析，一直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的柯林·克拉克根据大量的统计材料证明了配第论点确属真理，才在发展经济学中出现了“配第一克拉克命题”这个词汇。贸易条件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945年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曾经重视这一问题，但也缺少实证分析，只是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作为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汉斯·辛格和作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而与辛格意见相左的贝拉·巴沙拉，从浩繁的数据资料中作出对比分析，才使人们从不同结论中对这个问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第三，1945年前的西方经济学家在阐述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时，很少使用数学工具，很少利用数学的形式分析使理论得到更清晰明确的说明。诚然，数学不能替代理论，过分数学化已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而为世所诟病。但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适当通过数学手段以表述理论，阐述理论，从方法论说，则是正确的，从效果看，也是较好的。例如，利用国外资源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论点，然而，直到60年代中期，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两缺口”模式，用数学公式证明这种论点，国内储蓄不足国外补的思想才得到确切而鲜明的说明。又例如，西方经济学家也早已认识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然而，直到40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他们的增长模式，用数学公式把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系数之间的确切关系清晰地表明出来，人们才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既定的资本——产出比例之下，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提高储蓄率。

第四，1945年前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一般地说，都缺少系统性。它们或者只是涉及增长的含义，或者是只考察影响经济增长的某一方面的因素，或者只抽象地表示发展观，或者只侧重物质资本的分析，等等。总之，尽管在几个世纪中，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虽有所深化，有所扩展，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并未形成。

第五，1945年以前个别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较全面、比较系统，但还远远不是发展经济学。这个人就是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有极其丰富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思想，而且思想的线索是极其清晰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它表现在国民财富的增加上；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专业分工，一是从事生产劳动人数的增加，促使从事生产劳动人数增加的因数是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国民财富的增长不免要受资源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但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利用外部条件促进增长；经济增长既是一个宏观问题，它和国家的政策必然密切联系，而自由放任政策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既可以促进国内和国际的专业分工，又可以使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期看，一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多种前景。对比起来，斯密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思想较其他前人丰富得多，完整得多，系统得多。但也可看出，两百年前的历史条件毕竟限制了他，使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观察不深，视野不广。他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非常适合于十八世纪中叶正在发展中的英国，但还未形成、也不可能

形成具有当代意义的发展经济学。例如，他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简单地归因于专业分工，而看不见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作用。他冲破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对增长认识的束缚，却看不见服务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和三种产业在经济比重上的相对变化，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中，他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出发，先作抽象的推理，推论出三种状态的可能出现，后又不区别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以三个国家和地区——北美、孟加拉和中国——作为实例，证明进步状态、退步状态和静止状态的存在。斯密主张自由放任政策，从一方面说，是为了扫除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势力，从而适合于当时英国的环境的需要，从另一方面说，是为了让当时在国际上处于优势的英国经济力量压倒竞争对手，从而适合国际环境的需要。斯密鼓吹的无所限制的自由放任政策所具有的这些历史特点，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外情况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综上所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世纪中，随着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逐渐加速，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已各有侧重点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思想还不具备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应有的必要条件：系统、全面、有概括性、能利用现代分析工具并反映时代特点。因此，我认为，“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

二、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中居于什么地位？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本上已统一了认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60年代初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二阶段。

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中居于什么地位，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一是，凯恩斯学说与发展经济学无关；另一是，凯恩斯学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我对这两种看法都难以赞同。在另一篇文章中^③，我曾就第一种看法陈述了我的意见。这里，我只对第二种看法的异议作出说明。

持第二种看法者以拉尔为代表^④，他们的论证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日，正是凯恩斯学说在西方经济学占据重要地位之时，从而它就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们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主要基础；发展经济学即是由赫尔希曼、纳克斯、钱纳里、缪尔达尔、刘易斯、普雷维什等人提出的理论的总称；凯恩斯的政策思想即是凯恩斯学说；凯恩斯学说主张国家对经济直接控制，而以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也有同一看法，等等。我认为，这些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不够确切的。

应当对凯恩斯学说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凯恩斯学说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危机、大萧条的三十年代，凯恩斯针对时弊，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病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投资，造成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是三个因素：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基本心理规则，当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时，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结果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不同于资本设备的现行效益，后者不包含未来对现在的影响，而前者与预期相关，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抱着悲观的态度，这就使得资本边际效率不易提高；灵活偏好指人们对货币灵活性的偏好，这是长期存在的心理，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投机动机而大大加强，灵活偏好的存在使利率下降有一个最低限度，尽管货币数量再增加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资本边际效率不能提高，利率又不能下降，造成投资不能扩大。因此，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足加投资不足),是由这种社会所特有的心理因素所决定的,于是,就业量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就停止下来而不再增加,社会出现“富裕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凯恩斯是从一种现代的、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模式去分析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的。在这个模式中,注意的中心是总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与总就业水平有独特关联的是本期总产出价值或国民收入水平,可以说,凯恩斯宏观分析模式的焦点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于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的均衡点的位置。总消费和总储蓄构成总供给,总消费和总投资构成总需求。因此,国民收入是因变数,决定它的是作为自变数的前期消费和投资或可进一步分解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三个因素。在国民收入既定之后,它又对预期其他总体经济变量起着制约作用。凯恩斯认为,由于三大社会心理因素的客观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已不可能自我调节而提高有效需求。为此,必须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甚至实行赤字预算,以增加公共支出,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提高有效需求,力争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充分就业水平下实现均衡,但是,凯恩斯从未主张过国家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直接控制。

凯恩斯提出他的学说,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针对传统理论——新古典主义无力对反复出现并日益严重的危机与萧条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因此,《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年轻一代的欢迎,正如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说那样,“大规模失业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如果不得不继续告诉青年们,这不过是充分就业准则的暂时背离,所需要是削减工资,那就太不够格了。当时年轻凯恩斯社团的公认领袖保罗·萨缪尔逊曾把青年经济学家初读凯恩斯著作的激动,和英国诗人济慈初读史诗《荷马》时的心情相比。……凯恩斯著作不推翻这个制度而是挽救了它。对于不革命的人来说,它似乎是好得难以置信。对偶尔革命的人来说,它确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白天,仍然教旧经济学。而在晚上,从1936年起差不多每个晚上,几乎人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⑥就是这样,凯恩斯学说在美国和西方风行起来。

可以看出。凯恩斯学说是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定需要的经济理论。它研究的中心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它观察到的问题根源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因素——消费倾向、流动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它提出的对策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别渴求的回春之术——鼓励消费和扩大投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要害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供给不足和储蓄不足。社会上不存在那种“怕货物”的空头心理状态。如果认为凯恩斯学说是论证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发展经济学家这样说过和做过),竟然把有效需求不足视为问题的焦点而去片面鼓励消费、扩大投资,就必然造成过度需求,使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失衡。

当然,在注意到凯恩斯学说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凯恩斯学说中某些组成部分的一般意义。凯恩斯采用的是宏观分析模式,这一模式由于含有收入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对应、投资与储蓄恒等、货币作为宏观经济不可分离的要素等等可贵思想,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一般经济体系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研究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思想虽有其特定内容,但宏观管理对国民经济具有不可低估作用的指导思想却有一般意义。今日的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倡导自由经营的新古典学派所谓的完全市场作用可以把经济推向最优境界的条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除了努力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并发挥市场的适宜作用外,还需要在基础设施、结构转变、金融机制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工作,而这是个人无法作到的,政府应当而且可能承担这种任务。同时,为了保证

增长速度、实现发展目标，国家发挥计划指导作用也是必要的。然而，非常清楚，如果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采用了宏观分析模式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宏观管理的政策建议，就说他的学说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则是不恰当的。

发展经济学兴起以来，一直分为三个流派：一是以P·巴兰、S·阿明、G·弗兰克、C·富尔塔多等人代表的激进学派；一是以P·鲍厄、J·瓦伊纳、T·舒尔茨、G·哈伯勒等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一是以O·赫尔希曼、R·纳克斯、S·库兹涅茨、H·B·钱纳里、G·缪尔达尔、W·A·刘易斯、R·普雷维什等人代表的结构学派。激进学派的基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学派的基本理论基础是新古典主义，这两派的思想都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考虑，论发展经济学而置这两个流派于不顾，只把属于结构学派的发展经济理论等同为发展经济学，未免是以偏概全。就属于结构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而言，不能认为凯恩斯学说是他们各家之言的共同理论基础，也许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但很难说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和贸易条件恶化分析是以凯恩斯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强调的是劳动在部门间的转移。从劳动边际生产力差异决定了两部门的工资差异找到了劳动转移的动因、工业资本积累的泉源以及二元结构改造的机制，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思路是古典主义的流传、甚至是新古典主义的产物。缪尔达尔关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和回荡效应的分析，显然与凯恩斯学说没有多大的关系。库兹涅茨利用国民经济产值及结构的大量统计资料，通过计量方法研究各国经济增长，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实证统计分析。

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汇成了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即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流。他们的理论虽各有特点，但一般说来，又共有三种主要的看法：第一，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二，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三，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从未强调国家直接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这些共同看法的原因，可能是出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如资本是最稀缺的因素，迅速工业化体现了经济摆脱依附、实现独立的民族感情，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可能是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如古典学派一贯重视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可能是国际经验的反馈，如西欧经济复兴的成功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成就。凯恩斯学说也可能对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曾不同程度地触动过，但无论如何，它决不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的著作D·拉尔，把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笼统地说成是国家干预论，并贴上“直接控制的教条”（dirigiste dogma），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带有偏见的。

三、怎样看待“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6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出现了与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不相一致的情况。按照那些理论而作出的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奉行国内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实施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的结果，是经济上遭遇着种种困难。进口替代经过较为宽松的初始阶段之后，便出现了国际支付差的赤字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外汇的短缺和国内市场的狭小使进口替代由耐用消费品转向资本品的设想成为泡影。与此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比较快速的进步。在客观情况面前，发展经

经济学家们不能不对40年代末期以来的理论和政策，重新评价，在几个方面作出了修正和转变。首先，对经济计划化的得失和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重新作了评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曾相继地实行计划化，作为发展计划制订的方法，宏观经济模式、部门经济模式、以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的跨部门模式以及线性规划模式风行一时。然而，经济计划化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计划工作实际上存在着畸重畸轻的缺点。反过来，人们认识到，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并提供经济增长的刺激；二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它可以用来完成政策目标并避免直接控制下出现的低效率和腐化；三是可以提供广泛的信息而花费不高。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误，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误”。其次，对农业的偏见受到了纠正，认识到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影响之下，农业成了“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损害农业的地步，结果，农业被榨取了，伪装失业的概念被接受了，农民对刺激的反应力被忽视了。要发挥农业的作用，必须给农民提供经济机会，必须理解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再次，深化了对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开发的认识，看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不仅是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有的经济学家从分析中得到明确的结论：“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⑥。此外，还重新强调了国际贸易对发展的作用，并开始研究了投资项目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与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相比较，在基本思路、问题论证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之处，归结到一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更为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monoecomics)的束缚，提出了一些特殊理论，把单一经济学分解为“双经济学”(dual economics)。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则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无论在计划化的批评上，市场作用的重估上，农业与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强调上，国际贸易的再认识上，还是投资项目评估的研究上，都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大有新古典主义卷土重来，把发展经济学纳入单一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被人们称为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发展经济学的这种演变，是否意味着新古典主义之所以为普遍真理，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中重奏凯歌、不仅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线而且完全代替了结构学派和激进学派的思想呢？对这一问题，我持否定看法。

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在60年代中期以后向新古典主义转变，并不表明前阶段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纯属谬误，完全未起积极作用，相反，当时的理论和政策的确有其正确之处，在某些方面，的确对经济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争取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贫困是普遍现象，建国之初，百废俱兴，最感稀缺的必然是建设资金，最需要发展的是工业，从而扩大储蓄，加速资本形成，建立民族工业以谋求经济上早日取得独立，不仅反映了民族的主观愿望，也符合国民经济起步的客观要求。从经济结构上看，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和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有所不同，市场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条件，决定了它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往日走过的一段老路，对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而且，市场机制无论运行得多么灵活，却往往不能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例如，普遍富裕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而市场机制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少数企业和个人领先的。只有在相当长期持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才能逐渐地普及广大的人群，收入分配的差距才能渐渐缩小。然而，普遍贫困的减轻是人民企望的前景，它的实现不能旷日持久，新兴的国家不能袖手坐视，而应当在计划管理、政策干预等方面有所作为。对此，一些在第

一阶段极力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发展经济学家也逐渐改变看法，转而说他们并非主张政府必须接受自由放任的原则，而是主张政府应当利用、增进和加强市场—价格机制。政府不要完全依赖全面的、细节的管理控制，而可以通过价格变动来执行政策，可以为发展私人生产、增加输出和扩大国内市场提供价格和收入刺激，也就是说，他们主张的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应当同时并举。

其次，新古典主义在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并不表明它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唯一体系。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家依旧坚持说，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进行结构改革、社会改革。激进学派发展经济学家仍然断言，穷国是海外势力的牺牲品，是国际体系中的“晚到的发展者”，障碍穷国发展的力量不来自内部，而来自国际体系的活动。国际体系的格局是穷国对富国的依附关系或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关系，而市场力量将累积地强化国际不平等关系，在一方作为支配者的发达国家、一方作为依附者的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无障碍贸易”的结果，就是不发达国家走向贫困和停滞的开始。

新古典主义在发展经济学的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这门学科的缺陷。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在理论上缺少科学性，也不符合发展中国的现实情况。如前所述，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是单一经济学的主张者，他们不仅主张适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单一经济学，还往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往日发展经验来规范一切发展中国家。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还常常为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出现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辩护。

当然，也应该指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对旧学说的批评和一些新观点的提出，是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纠偏和修正。然而，这正表明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有了比过去较为全面、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正表明了发展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完善。不能把这种演变简单地说是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走入了死胡同，也不能把这种演变简单地说是新古典主义的取得全面胜利。恰当的认识应当是，一门新的经济学科正在发展，正在向纵深发展。

四、发展经济学是否已陷入贫困、停滞甚至走向衰亡？

如果说，60年代初期以前、特别在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一般地对他们的学说的现况和前景，抱积极乐观的态度并满怀信心，那么，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转变了态度，对这门学科的现状作出悲观的估计，并为它的前景感到担心，纷纷撰文，用“停滞”、“贫困”、“衰亡”、“死亡”等词来表达他们对这门学科的看法。

态度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发展的现实和理论与政策的预期远不一致。初生的发展经济学描绘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发展的客观情况却是令人沮丧的。尽管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较快并从而使全部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尚令人满意，但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则一直很差，从1955年到1980年，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人均收入25年来平均增长率仅为1.2%，而且从1970年到1980年，十年中毫无增长。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穷国和富国在实际购买力比较和简单的名义收入比较这两个方面的差距变得更大了。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划分的标准，发展中国家中有31个称为最不发达的国家，它们的状况不仅没有改进，而且还在恶化，1979年，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起来也只占世界总额的0.4%。发展中国的另一重困难是贸易

条件的恶化，7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下降了25%，而进口制造品价格指数却上涨了17%。发展中国家的又一重困难是外债负担日益沉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逾一万亿美元，并以每年400亿到5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除了这三重困难以外，发展中国家还一般地存在着三个问题：人口压力大，抵销了国民总收入的增长，使人均实际福利增进很小；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不变，占人口大多数的部门仍然是“农民农业”；失业、分配不均，城市过度膨胀等等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五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设想一种发展模式：“去掉农民”，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随着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国民收入继续增长，最终使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而客观情况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所得到的却是如前所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虽然从总量上说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经济上各有不同速度的增长，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国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却变化较慢，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出现了“发展危机”。

另一方面，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了研究方法，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研究，转变为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国别研究，他们认为，客观情况已经表明，很难找到能为全部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制度的、非经济因素，并把它们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式之内。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和办法来使它们增长中的人口丰衣足食并提高教育文化水平，而不愿再墨守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条条框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日渐丰富起来，使人们对某一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研究成为可能。总之，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似乎解体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似乎将要渐渐消亡而归属于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之中了。

面对上述情况，有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免怀念50年代中经济发展理论蓬勃向上、汇为一体的盛况，而对发展经济学以后的演变则有江河日下之叹。例如，曾提出有名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的赫尔希曼，就以《发展经济学的兴衰》为题撰文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在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这一领域里的各种基本思想和模式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引起争论，使这一分科充满了活力。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研究对象——亚非拉美最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最近，这种独特的差距消失了。不幸，这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飞速加快，而是因为我们这一分科的发展停滞了。”^⑦但从全文的基调，我们可以体会到，赫尔希曼的这种式微之叹，不过是出自一种怀旧的情绪，而并不反映他对发展经济学已经感到幻灭和绝望。相反，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成就是肯定的，对它的变异也是肯定的。在后来不久的一篇文章中，他说：“在差不多25年之后，去回顾一部作品，说哪些思想仍然正确，哪些思想已经站不住脚，哪些思想曾经有益，哪些思想曾经有害，恐怕是徒劳的。……作者自己是难以判断的，他们能够作到的是使读者相信，在那些归的‘写出来的和描绘出来的思想’中仍然栩栩有生气，而且以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在继续演变。……新学说和新思想的效应，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迂回曲折得多。……这就是新思想的间接的补充效应，和人们通常考虑的直接的劝说效应是相对立的。而恰恰是补充效应比劝说效应更为重要、更为持久。”^⑧可见，赫尔希曼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已陷于停滞，不过是一时愤激之言。

对发展经济学的过去，彻底加以否定，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认为必因贫困而步向灭亡的代表人物是前面提过的拉尔，他说：“在这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时代，要在自由放任主义和直接控制教条之间步中间道路，也许是空想。然而，就我而言，根据前述的对发展经济学的反复抨击，我不能和赫尔希曼一起去悲叹它的衰落。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死亡，

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共同兴旺。”^④

拉尔对发展经济学的判决，立足于他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如认为凯恩斯学说是它的主要理论基础，直接控制是它的中心教条。而如前所述，它的基本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而他的“反复抨击”并未打中要害。他的判决看来是出自误解和偏见。

我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年轻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在发展，这是不能闭目不视的事实，这种事实不断要求着经济学家们从复杂现象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所走的道路也不是一致，因此，又会累积多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从而发展经济学将在多方面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成为一门理论日益丰富、日益深入、日益系统化的学科。

发展经济学在过去曾对促进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今天并未陷于贫困和停滞，在未来也不会衰落和死亡。

注释：

① H. W. 阿恩特：《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载J. 巴格瓦蒂和R. S. 埃考斯合编《发展和计划》，纪念P. N. 罗森斯坦—罗丹论文集》，1972年版。

②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序论及全书设计》。

③ 参看《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3—11页。

④ D.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 J. K. 加尔布雷思：《凯恩斯学说怎样传播到美国》，载《纽约时报书评》1965年5月号。

⑥ F. H. 哈比森：《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

⑦ O. 赫尔希曼：《发展经济学的兴衰》，载《经济学季刊》1980年第4期。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第30页。

⑧ G. M. 梅厄和D. 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第110—111页。

⑨ D.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第109页。